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郑炳林
杨富学

主编

Series of Ethnic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ncient Northern China

XIXIA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杨富学 陈爱峰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 杨富学, 陈爱峰著. --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4
(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421-1857-8

I. ①西… II. ①杨… ②陈… III. ①西夏—外交关
系—研究—1038~1227 IV. ①K2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9273号

书 名: 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

作 者: 杨富学 陈爱峰 著

责任编辑: 刘新田 瞿广业

装帧设计: 马吉庆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印 刷: 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375

字 数: 379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21-1857-8

定 价: 32.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 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 <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 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 0931-8773271 (传真) E-mail: 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敦煌文献中除了汉文文献之外，还有很多非汉文文献，如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藏文等，特别是藏文文献以其规模大、内容丰富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涌现出一批以研究敦煌藏文文献而著称的专家学者，出产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他文献的研究也普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汉文少数民族史料的研究也同样成绩突出。汉唐时期敦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根据敦煌文献记载，这里生活的居民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将近百分之三十是少数民族，主要有粟特、吐蕃、回鹘、于阗、达怛、吐谷浑、龙家、通颊等也生活在这里，而敦煌周边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南山、回鹘、于阗、唃末等，所谓敦煌四面六藩围，关于敦煌及其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研究有很多成果，这套丛书就是集中了课题组的部分研究成果，呈现给学术界，以便今后研究中参考利用。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



开放的产物，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基地，早在 1979 年就建立敦煌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二期、三期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22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发挥了引领研究发展的作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余册，为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截至 2011 年，出站的博士后 6 人，毕业博士 67 人，18 人晋升教授（研究员），其中 8 人任博士生导师，24 人晋升副教授（副研究员），38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10 余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1 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 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前后接收留学生 40 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留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特别是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得到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 120 多项，经费 1000 多万元。陆续推出了一批学术丛书，主要有“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吐蕃文献选辑”、“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石窟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



汉学精粹”和“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丛书”等，正在进行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学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因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序

史金波

在杨富学博士及其弟子陈爱峰合力撰著的《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出版前，富学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该书是他们近些年关于西夏研究的新撰，集中研究了西夏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编，依次论述了丝路与商贸往来、宗教与文化交流及民族与民族关系诸问题。其中有些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发表过，早已拜读，受益匪浅。这次打开书稿，又见不少进步和亮点，感慨良多。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自称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国。党项羌是其主体民族。西夏王朝从李（嵬名）元昊正式称帝建国，至被蒙古所灭，共传 10 主，历时 190 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若加计西夏建国前党项政权存在时间，前后共有 300 多年历史。西夏在中国历史画卷中占有浓彩重笔的重要画面，它曾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不少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西夏舞台上演绎出生动剧目，西夏的赫赫武功和非凡战例在中国军事史册中可圈可点。西夏文化，特



别是应用广泛的独特文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地中的奇葩。然而在西夏灭亡后，其遗存文化受到极大摧残。在西夏首都今银川市除承天寺外竟很难找到西夏建筑遗迹，贺兰山下西夏陵园地面殿堂建筑荡然无存，连众多的石碑也被人为破成碎块。20世纪以前竟不见一部西夏人编写的典籍，西夏文字作为死文字进入历史博物馆。有修史传统的中国在元代修正史时未修西夏史，记载简略的西夏史实仅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难以反映西夏历史全豹，致使西夏历史模糊不清。西夏资料匮乏使后世治西夏史者深感困惑。西夏作为鲜为人知的神秘王朝，成为中古历史研究的难点。

西夏研究虽可追溯至很早，但作为一门真正学科，西夏学发轫于20世纪初。当时国外所谓“探险队”，乘中国国力衰弱之际，纷至沓来，掠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物、文献。在著名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1908~1909年以俄国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为首的探险队，于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有数千卷册，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这些文献和文物，具有巨大学术和文物价值，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这些珍贵的文献和文物，开启了西夏学之门。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国学巨匠如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罗振玉等，皆参与西夏研究，特别对华丽、匀称而疏朗的神秘西夏文字解读饶有兴趣，筚路蓝缕，成绩斐然。后吾师静如先生和罗福苾、罗福成等前辈，刻苦深研，著作累累，奠定基础，跻身国际西夏学林。近三四十年来，国内外西夏专家解难破疑，钩沉致远，拓宽领域，发展成熟，使西夏历史文化逐步变得清晰，使西夏学成为学界关注的学科。

富学是一位回鹘学专家，又是敦煌学和佛学专家，但他还

关注西夏学，不断撰写有见地的论文，实为难能可贵。举凡敦煌学、藏学、西夏学、回鹘学，皆属带有综合性的学科，其内容往往包含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民族学、法律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学等，甚至还涉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医学、建筑学以及纺织、印刷术等方面知识。因此做这类学科研究，需要逐步积累多方面知识。而每学习一门新知识，都要披览很多书籍，求教很多专家，总之要下很大功夫。个中甘苦，只有当事人才有切身体验。富学给我的印象是像绷紧的发条，不断学习、不怕吃苦，勇于进取；又像是一块海绵，善于吸收、善于容纳，博采众长。他的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增容，随着研究的需要而涉猎广泛，终于成为博学多才的学者。

随着社会飞速进步，信息量陡然增加，研究工作者的视野也日益宽阔，各相关学科互相接触，互相渗透，互相兼容，往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态势。以西夏学为例：西夏王朝掌控敦煌近两个世纪，期间于敦煌莫高窟、东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处创建、改建洞窟数十座，留下大量珍贵文化艺术遗存。因此西夏研究在敦煌学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西夏信奉佛教，藏传佛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藏族不仅是西夏近邻，还有不少藏族在西夏境内，成为西夏居民。藏族文化已融入西夏文化，成为西夏文化的有机组成。藏学和西夏学相互交叉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西夏征服了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境内有很多回鹘人。回鹘人在西夏佛教传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特殊作用。西州回鹘也成为西夏的近邻。西夏学和回鹘学也有难解难分的关系。而敦煌学与藏学、回鹘学之间，也有相互交会重合之点。首先将敦煌学和西夏学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是常书鸿和王静如二位先生。早在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



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进行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先生主持，宿白先生作顾问，李承仙先生任秘书长。我有幸参加此次为期3个月的实地考察，并向诸先生请教。当时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这是把敦煌学和西夏学熔为一炉的多学科成功合作尝试。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席卷全国的“文革”就开始了。有关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考察研究成果在“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公布。

前些年我曾一再提出：西夏研究涉及门类很多，需要请很多学科的专家参加研究，集思广益，通力合作，才能使西夏资料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犹如专家会诊，各展所长，互益互补，能突破旧囿，拓宽思路，获取新见。富学从所熟悉的敦煌学、回鹘学角度切入、观察、研究西夏，自有新颖认识，这是不熟悉敦煌学、回鹘学的人难以做到的。比如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西夏与回鹘之贸易、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西夏与回鹘势力在敦煌的兴替等内容，在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又有新的考论，令人耳目一新，提升了对西夏与回鹘关系的认知。

富学不仅探讨西夏与回鹘的关系，也涉足西夏后裔的调查研究，建树良多。关于西夏后裔，世人十分关注，也是西夏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1980年我曾和宁夏博物馆吴峰云先生根据史料的线索，到安徽合肥和安庆地区调查西夏后裔，找到数千西夏后裔，并发现两部族谱，1983年发表了《西夏后裔在安徽》的论文。这是第一次调查发现确切根据、传承至今的

西夏后裔。后河南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穆朝庆先生在河南濮阳县发现建于元顺帝至正十六年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并调查当地西夏后裔，1986年发表《略谈河南省的西夏遗民》的论文，使学界知河南西夏后裔。濮阳当地西夏后裔不仅保存有族谱，还发现元代西夏后裔编著的、反映西夏后裔社会情状的著作《述善集》。富学对西夏情有独钟，本人又是河南人，便着力对该书进行研究，出版了《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一书，并发表《〈述善集〉与元代西夏遗民研究》、《西夏遗民乡约元代西夏遗民〈龙祠乡约〉探析》以及《元代西夏遗民文献〈唐兀公碑〉校释》等文，后收入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中。他近期撰写的《二十世纪西夏遗民研究》一文，综论上世纪对西夏遗民研究的概况，脉络清晰，表明他对西夏后裔的持续关注，我也期待着他预期中的《〈述善集〉与西夏遗民研究》一书的问世。

我痴长富学20多岁，应算两代人。我认识他较早，但谋面不多（近来才逐渐多起来），而会面必谈学术，并无代沟阻滞。去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参加中国蒙古学·阿尔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富学也与会。我报告了《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论文，依据服饰特点和西夏法典有关资料提出莫高窟409窟男供养像为西夏皇帝。报告后征求富学意见，他提出不同看法，我们各抒己见，反复研讨。在阅读本书时我发现几处考证论述有些疏漏，向他提出，希望能更加严谨。他很快回函，表示接受。我为这种不分年龄的学术互动感到欣喜，为富学率直的治学态度表示赞赏。

2008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从西夏学来说，今年是世界瞩目的重要西夏资料黑水城文献发现100周年。在岁末之际，杨富学博士的这部专著给方兴未艾的西夏学增添了新的收



获，确实可喜可贺。

拉杂琐碎，忝为序。

2008 年岁末于北京寓所

前言

西夏是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党项羌人所建立的政权，自元昊于 1038 年称帝立国至 1227 年亡于蒙古，传 10 帝，存国 190 年，几与宋辽金诸王朝共始终。西夏虽地域广袤，文化昌明，但辖境毕竟局限于西北一隅，不像辽朝、金朝那样曾先后将其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占据有中原地区的半壁江山，故而元人在撰写正史时，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纂修辽、宋、金三史，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独没有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这种修史方法本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西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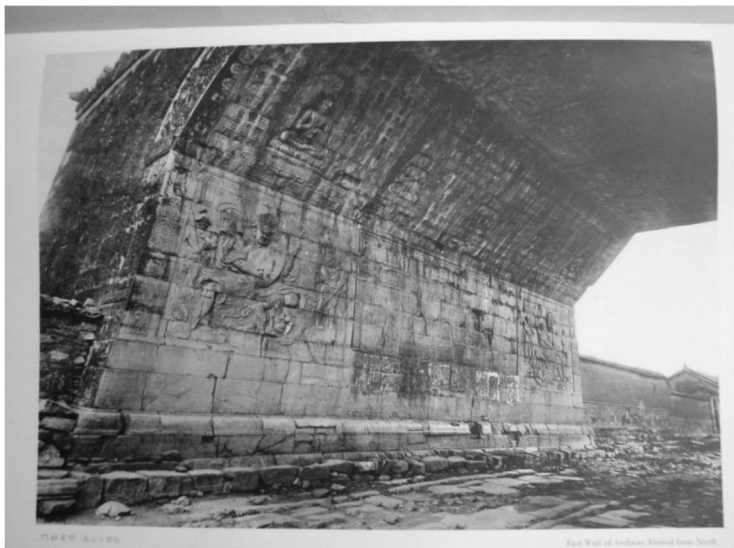
保定明代
西夏文石幢



史料的很快湮灭亡佚，给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学术界对西夏的重视是从 20 世纪初黑水城（又作黑城）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开始的。西夏文是流行于宋初到元代的西北党项民族的文字，到明朝中期已彻底死亡。最后的西夏文证据是河北保定市韩庄发现的勒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4 年）的西夏文石幢 2 座，1962 年发现，今保存于河北保定市莲花池公园。

对于西夏文的重新认识，最早始于 19 世纪初，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发现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



居庸关过街塔

19 世纪末，英、法学者考证北京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壁上

六体文字是否有西夏文，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1908 年，俄国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1863～1935 年）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掘到了西夏文写本，受到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一种过



黑水城西侧大塔遗址

去不甚了解、当时尚未解读的神秘文字。科兹洛夫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1909 年再次到黑水城遗址继续发掘寻找，在故城西面河岸边著名的大塔发现了一个皇家地下图书馆，收藏极为丰富，用 40 匹骆驼携归圣彼得堡，共有八千多个编号，其中有西夏文文献、汉文文献及部分其他少数民族文献。此外，英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年）亦曾于 1914 年到达黑水城，经过发掘，获大量西夏文献，现均藏大英图书馆。全部残页编号约 7000 多个，其中，编入 Or. 12380 西夏文序列的文献即有 7300 多号，另有编入 Or. 8212 系列的汉文文献 243 号。经过初步拼合，得文献 4000 余件。



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是研究西夏政治、社会、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第一手资料。黑水城文献的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并称的 20 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有人称之为中国近代新材料第五大发现。^①

由于黑水城文献以俄罗斯收藏居多，而且文献保存状况相对要好，不像英国所藏多为残页，故学界早期对西夏文献的释读与研究主要是以俄罗斯藏品为对象的，研究工作也主要是由俄罗斯学者进行的，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最为丰硕。较早从事黑水城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有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等人，二战结束以后，涌现出了戈尔巴乔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克恰诺夫（Е. Н. Кычанов）、克平（К. Б. Кепинг）、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索夫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和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А. П. Тереньев-Катанский）等一大批致力于西夏学研究的学者，其中以伊凤阁、聂历山、克恰诺夫的成就最巨。伊凤阁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订了许多西夏文佛经文献，于 1961 年出版了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部分片段并附有汉译文；聂历山同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合作发表了不少关于西夏佛教研究方面的论文；克恰诺夫从藏族文化、法律等角度出发论述了西夏的佛教，著述了一系列的文章；克恰诺夫及孟列夫等人都在黑水城佛经文献的分类整理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 孙继民、刘广瑞：《黑水城文献：中国近代新材料的第五大发现》，薛正昌主编：《西夏历史与文化——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93～299 页。

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在国际上仅次于俄罗斯，石滨纯太郎、田村实造、常盘大定、川上天山、小高裕次、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野村博等诸多学者分别从西夏文写经、译经及佛教史等方面对西夏的佛教有着较多的论述。

国内学界对黑水城西夏文献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初期，开其先河者为罗振玉、罗福苕、罗福成父子和王国维、王静如、周叔迦等人，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1949 年以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人加入到西夏学领域中来，涌现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先生著述颇丰，有《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社会》、《类林研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等。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著有《西夏研究论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研究》、《西夏语比较研究》等，主编有《夏汉字典》、《西夏通史》等。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著有《西夏文物研究》、《西夏谚语》、《贞观玉镜将研究》等著作。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白滨、聂鸿音、孙伯君，宁夏大学杜建录，宁夏考古研究所牛达生、孙昌盛，武威市博物馆孙寿龄、陕西师范大学韩小忙等，都或多或少地致力于对西夏文文献的译释与刊布，在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及木活字印刷、西夏法典等方面的探讨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不管国外还是国内的西夏文研究者一般都将注意力放在俄罗斯的收藏品上，其实，国内收藏的西夏文文献也很丰富。1917 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掘获两大箱（亦有四大箱或五大坛之说）西夏文文献，除少部分为地方官吏所瓜分而辗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甘肃、宁夏及日本等地外，大部分于 1929 年运至北京，皮藏